



中国图书文化史

主编 曹之

中国古籍校勘史

罗积勇 李爱国 黄燕妮 著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

中国图书文化史 主编 曹之

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本书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成果
(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: 2012YB008)

中国古籍校勘史

罗积勇 李爱国 黄燕妮 著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籍校勘史/罗积勇,李爱国,黄燕妮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5.3

(中国图书文化史/曹之主编)

ISBN 978-7-307-12980-1

I. 中… II. ①罗… ②李… ③黄… III. 古籍—校勘—图书史—中国 IV. G25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4485 号

责任编辑:李 琮 责任校对:汪欣怡 版式设计:马 佳

出版发行: **武汉大学出版社**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 × 1000 1/16 印张: 26.25 字数: 374 千字 插页: 2

版次: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2980-1 定价: 78.00 元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凡购我社的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总 序

我是一个不好写序的人，尤其不喜欢写代序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：“代序却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，仿佛名角一登场，满场就大喝一声采，何等有趣。倘是戏子，就得先买许多留声机，自己将‘好’叫进去，待到上台时候，一面一齐开起来。”（《准风月谈·序的解放》）为了回避“吹鼓手”、“戏子”之嫌，我决意不为“代序”，因此得罪了一大批人，包括我指导过的几位博士生。不过，经过解释，博士生们已经理解了我的初衷。导师为博士生写序，似乎成为一种“专利”，我愿意放弃这种“专利”。这篇序言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因为当了“主编”，总要讲几句话。

人们常用“图书大世界”形容图书之多。的确，世界充满图书，图书充塞世界，图书无处不在，无时不有，人类生活在图书的层层包围之中。人们常用书山、书海、汗牛充栋、恒河沙数、连窗委栋、擢发难数、积如丘山等词语形容图书之多，一点儿也不过分。自古以来，我国就是一个读书的大国，众多褒贬不一的“读书迷”，有五花八门的称号，清张培仁《妙香室丛话》卷六云：

汉世目郑康成为“经神”；何休为“学海”；晋杜预有“左传癖”，人目之曰“武库”，言胸中无所不有也。江祐目许懋为“经史笥”；梁世目任昉为“五经笥”。褚遂良目谷那律为“九经库”；又目虞世南为“行秘书”，皆美其淹识群书也。至晋傅迪好读书而不解其义，刘柳惟读《老子》，迪每轻之，柳曰：“卿读书虽多，而无所解，可谓‘书簏’矣。”唐李善淹贯古今，不能属辞，人号“书簏”；齐陆澄世称硕学，读《易》三年，不解文义，欲撰《宋书》不就，王俭戏之曰：“陆公，‘书厨’也。”似犹有讽焉。他如宋宜黄李郭，文学浩博，人号为“书厨”；福清郑格，博闻强记，时亦号“书厨”；莆田李纲，通诸史百家，人亦目为“书厨”；通州张大中，群经百氏，一览不忘，人目为“黑漆书厨”；邛州吴时敏，于为文未尝属稿，人目之为“立地书厨”，明武进陈济，六经子史，无不究竟，时称为“两脚书厨”；南海唐奎，遍览诸书，称为“唐书柜”。或有过誉，要皆美词也。

随便打开一部词典，就会发现由“书”组成的关键词滚滚而来，如：书卷、书帙、书城、书籍、书笈、书笥、书香、书院、书袋、书钞、书桌、书台、书种、书影、书录、书虫、书囊、书楼、书厄、书跋、书口、书脊、书缝、书祸、书价、书史……由图书而命名的斋堂室名也很多，如读书堂（司马光）、绉书阁（叶梦得）、万卷楼（尤袤）、野史亭（元好问）、汲古阁（毛晋）、赖古堂（周亮工）、士礼居（黄丕烈）、思适斋（顾广圻）、十驾斋（钱大昕）、积古斋（阮元）、四当斋（章钰）、双鉴楼（傅增湘）、瓜蒂庵（谢国祯）……甘桁《斋名集观》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）著录的1000多个室名大多与图书有关。与图书有关的行业也很多，如书店、书铺、书局、书肆、书林、编撰、出版、发行、藏书、校勘、辨伪、辑佚……三百六十行生意，不少生意和图书有关。与图书有关的故事也很多，如囊萤、警枕、映雪、三余、三上、推敲、祭书、断织劝学、凿壁偷光、一字之师、著书自娱、露钞雪纂、断齑划粥、十年

磨一剑、三年不窥园、头悬梁锥刺骨……詹文元等编《勤学成才故事 160 个》(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 年版)讲的都是与图书有关的故事,该书第 76 则故事云:唐代武后年间,河阴有位叫郗珍的人,家贫如洗,但酷爱读书。晚上没有灯光,不能读书,非常苦闷。突然发现富户邻居的墙角有一线灯光,郗珍便仿照汉代匡衡“凿壁偷光”的故事,把透光的缝隙凿大,趴在地上读书,津津有味。后来,邻居发现了这个秘密,一纸诉状把郗珍告上官府,诬称郗珍意欲盗窃财物。郗珍实话实说,称自己为了借光读书,并无他意。县官康庭芝亲自审理此案。他经过调查研究之后,作出一审判决,在《对求邻壁光判》中说:

郗珍荷衣横带,缉柳编蒲,有贱赢金,将希片玉。南都自富,北郭实贫。殊谢梁鸿,不求因热。乃如苏季,愿借余光。已接武于匡衡,方齐踪于甯越。室仞非邃,未窥夫子之墙;纺绩可兼,辄凿邻人之壁。情非窃伏,事涉穿窬。抑有前闻,宜征故实。请从按记,不合论辜。(《全唐文》卷二百六十《康庭芝》)

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我的家乡: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。广武,因在黄河南岸,唐称河阴县。与图书有关的学问更是多如牛毛,如周易学、尚书学、诗经学、三礼学、春秋学、史记学、汉书学、尔雅学、本草学、水经学、通鉴学、文选学、四库学、红学、经学、史学、子学、编撰学、版本学、传播学、校勘学、辨伪学、辑佚学、阅读学、目录学……随着时间的流逝,科学研究向细密发展,学中有学,学又有学,子又有孙,孙又有子,子子孙孙,无穷匮矣。

历代图书知多少?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。就拿线装古籍来说,我在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第二版(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)中曾据下列数字进行过一次粗略统计:

(一)上海图书馆编《中国丛书综录》著录丛书 2797 部,子

目 7 万种，去其重复，计有单种文献 38891 种；

(二)清代乾隆以前没有收入丛书的古籍单行本至少有 1 万种；

(三)清代乾隆以后没有收入丛书的古籍单行本，据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与《贩书偶记续编》著录，计有 1.6 万种；

(四)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共著录方志 8200 种；

(五)佛经单种文献 4200 种；

(六)道藏单种文献 1500 种；

(七)据全国 59 个图书馆联合编制的《中医图书联合书目》著录，中医单种文献约有 7661 种；

(八)碑帖、舆图不少于 1 万种；

(九)少数民族语言图书不少于 1 万种；

(十)车锡伦编《中国宝卷总目》著录成代宝卷 1579 种；

(十一)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《中国家谱综合目录》著录家谱 14719 种；

(十二)谢巍编《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》著录历代年谱 6259 种；

(十三)许保林编《中国兵书知见录》著录存世兵书 2308 种；

(十四)杨忠、李灵年编《清人别集总目》著录清人别集 4 万种；

(十五)王宝平等编《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》著录和刻本 3063 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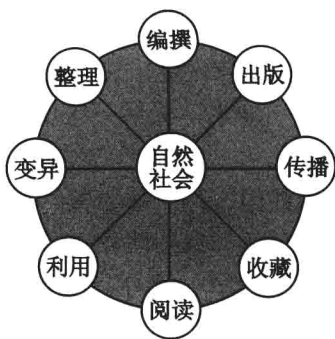
以上 15 个数字相加，共得线装书 174380 种，去其重复(还有少数现代著作、平装图书等)，加上诸目漏收的线装古籍，总数当不少于 15 万种。如果加上复本，单是传世至今的古代线装书，当不会少于 1000 万册。历时 15 年编撰成功的《四库全书》收书 3503 种、79337 卷，共计 9.97 亿字。18 世纪中叶，法人狄德罗主编的《百科全书》共计 2268 万字，《四库全书》是它的 44 倍。若把《四库全书》

约4000万页逐一摊开，首尾相接，可绕地球赤道1.34周，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可见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。实际上，古代图书可分两个大类：亡佚图书和传世图书。二者相比，由于自然老化、天灾人祸等原因，亡佚图书的数量当远远超过传世图书的数量，传世图书只是亡佚图书的若干分之一。历代许多文献学家试图计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图书数量，但是一个个大汗淋漓，无功而返。最后只好老老实实用“浩如烟海”四个字作为结论了。

图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，是一环紧接一环的锁链式运动过程，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环节上。每个环节的发展又与社会生态文化密切相关，没有“单干户”。现在，关于图书的学科很多，出版专业有“古籍编撰史”、“古籍出版史”等；图书馆学专业有“古籍分类”、“古籍编目”等；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有“古籍校勘”、“古籍辨伪”……各种学科之间判若鸿沟，壁垒分明，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，大有中分天下、一决雌雄之势。静言思之，这些学科局于一隅，实则专科文献学，目前尚无真正海纳百川的广义文献学。对于各个专业来说，从微观上划分“势力范围”，固然需要，但从宏观上鸟瞰天下，也不可少。只讲微观，不讲宏观，容易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。中国有句俗话：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”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当局者“迷”在微观，旁观者“清”在宏观。从横的方面看，“当局者”没有看到大千世界，或者没有把大千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；从纵的方面看，“当局者”没有看到悠悠岁月，或者没有把悠悠岁月看做一个承前启后的系统。“当局者”跳不出一地、一时、一人、一书的狭小范围，不能耳听六路、眼观八方，不能“会通”地研究问题，因而迷惑不解。苏轼《题西林壁》诗云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这首诗是“当局者迷”的形象写照。

古代图书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图书编撰出发，经由图书出版、图书传播、图书收藏、图书阅读、图书变异、图书整理，进入新一轮的图书编撰。其中，“传播”包括书业中心、畅销书、中外交流等；“收藏”包括目录、分类、保护等；“阅读”包括标点、训诂、检索、

翻译等；“变异”包括伪书、散佚等；“整理”包括校勘、辨伪、辑佚等。一部图书史就是这样无限循环、环环相扣、周而复始、螺旋式上升、不断发展的历史，如下图所示：



基于上述认识，我拟把中国图书文化的发展分为“中国图书编撰史”、“中国古书编例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官修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序跋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抄写史”、“中国印刷术的起源”、“中国图书刻印史”、“中国图书版本学”、“中国图书装帧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插图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发行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广告史”、“中国古代禁书史”、“中外图书交流史”、“中国古代聚书史”、“中国秘书省藏书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散佚史”、“中国图书目录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分类史”、“中国图书保护史”、“中国图书阅读史”、“中国图书训诂史”、“中国图书翻译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整理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校勘史”、“中国图书辨伪史”、“中国图书辑佚史”、“中国图书与生态文化史”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题目。

作为教师，我们的一生就是藏书、读书、著书、教书的一生。生活就是图书，图书就是生活。用“嗜书如命”四个字来形容，一点儿也不过分。除了文盲，每一个人都有终身难忘的与书有关的经历，每一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与书有关的故事。一本书就是一位老师，一本书就是一个台阶。图书，打开了一扇透风的窗口；图书，改变了我们的命运。爱书吧，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鲁迅先生也很爱书，他说：

该如爱打牌的一样，天天打，夜夜打，连续的去打，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，放出来之后还是打。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，而在有趣。牌有怎样的有趣呢，我是外行，不大明白。但听得爱赌的人说，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，永远变化无穷。我想，凡嗜好的读书，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。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。（《而已集·读书杂谈》）

早就想编一套关于图书文化的丛书，表达我们对于图书的无限感激之情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这次收入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的暂时只有以下 13 种著作：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（一）《中国古代图书史》 | 曹之著 |
| （二）《中国古籍编撰史》 | 曹之著 |
| （三）《中国古书编例史》 | 马刘凤、曹之著 |
| （四）《中国图书官修史》 | 霍艳芳著 |
| （五）《中国古籍序跋史》 | 王国强著 |
| （六）《中国古代文献的保护》 | 王国强等著 |
| （七）《中国印刷术的起源》 | 曹之著 |
| （八）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 | 曹之著 |
| （九）《中国图书发行史》 | 孙文杰著 |
| （十）《中国秘书省藏书史》 | 郭伟玲著 |
| （十一）《中国图书散佚史》 | 李玉安著 |
| （十二）《中国古代的藏书印》 | 吴芹芳等著 |
| （十三）《中国古籍校勘史》 | 罗积勇等著 |

其中，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、《中国印刷术的起源》和《中国古籍编撰史》三书已于多年前出版，社会反映尚可。武汉大学出版社坚持要把三书纳入该丛书一并出版，我也只好遵命，十分感谢出版社的美意。该丛书作者大多从事古典文献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，具有硕士、博士学位，有的已是教授（研究馆员）或博士生导师，且已出版过多种著作，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和写作经验。2007 年年底，

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初定书名、著者之后，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。几年来，作为主编，我做了以下事情：（一）草拟分册提纲。提交编务会议进行讨论，以期集思广益，统一认识。（二）编制《中国图书文化史资料索引》。把知见材料公布于众，按照内容发给著者参阅。（三）举办小型资料展览会。2008年3月至4月30日，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举办了一次小型资料展览会，我把自己的部分读书笔记《目耕录》42册、剪报资料《刀耕录》40册和私人藏书97册，面向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著者公开展出，读者可以抄写、复印或拍照。资料者，天下之公器也。这样做，是为了方便大家，资源共享。（详《图书情报知识》2008年第3期卷首语）（四）互通情报。著者遇到什么问题，可随时通过各种方式向主编反映；主编如有什么新的想法，或有什么新的“发现”，可随时向著者“通气”。（五）借阅图书。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著者随时可以向主编借阅有关资料，主编藏书犹如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的“资料室”、“图书室”，全天候面向各位著者。（六）从2007年年底到2011年，先后八次召开编务会，并印发会议简报。每次会议重点强调两个问题：一是抓紧时间，时不我待。既然我们已经签订合同，作出承诺，就要做到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”。二是创新意识，宁缺毋滥。大家认为，如果没有创新之处，宁可不写，不能徒灾梨枣。大家一致表示：要学习古人的传世意识和精品意识，珍惜这次机会，精心打造传世之作。否则，无法向读者交待，无脸见“江东父老”。此外，还就书名、编例具体问题展开讨论，统一认识。不过，还要说明两个问题：一是关于时间下限问题。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的时间下限一般定在辛亥革命（1911年）清代灭亡为止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个别图书的内容或超越此界。二是关于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的整合问题。由于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内容较广，涉及问题较多，加上各位著者认识水平不一，各书之间或有重复，间有不大统一的地方，敬祈读者谅解。当然，有些问题本来就是聚讼纷纭，还没有形成共识，著者各抒己见，也算是“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”吧！

现在，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终于出版了。我对各位著者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，没有各位著者的密切配合，编制这套丛书是不可能

的。我要感谢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、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、武汉大学出版社，没有它们的鼓励和支持，编制这套丛书也是不可能的。谢谢大家！

曹 之

2012 年 3 月 10 日

前 言

中国古籍数量巨大，这些书产生于不同的时代，距今远则三千余年，最近也有百余年来。中华民族崇尚文治，很早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古书之能够流传，实与古书之经常被阅读、被利用有很大的关系，而古书之能够被阅读、被利用，则离不开古书的校勘。

在宋以前的抄本时代，人们边抄边校，抄后再校；己书要校，借人之书有时也为之校；原刻即校，后世学者又为之校注，而影响更大的则是国家组织学者来校，有时还将校定之经典文本刻成石经，立于太学以昭示天下。

自宋代始，雕版印刷广为推行。至于明清，印刷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，这都给书籍的刻印流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。一方面，使抄本时代的校勘成果得以保存，另一方面，翻印书、新刻书也得到了广泛的校勘。虽然后世刻书有官刻、私刻、坊刻之差异，校勘的态度和校勘的质量也常常不能相提并论，但重视校勘已然成为中国图书文化的一大特点。官方、私人、书坊对于自己所重视的经典之书、实用之书，一般是注重校勘的，特别是在文治鼎盛的宋代和文化复兴的清代，古书校勘事业十分发达，不但校刻出了堪称精品的古书，而且留下了极具学术价值的校勘记，造就了一批批精于校勘

的学者和大师。这些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校勘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抄本时代的校勘成果保存到今天的很少，隋唐以前主要见于当时学者关于某一古书的笺注和音义中，在杂著中偶尔会有些条目涉及。唐宋时，学者往往撰写学术笔记。有的还是专谈古书考辨的学术笔记，这类书中谈校勘的资料，一般是经过精选的，所以特别珍贵。宋代及宋代以后更出现了专书校勘记和群书校勘记。清代学者笺疏古书、考释古书中的疑难之处，常常是与校勘分不开的，因此，无论是专书笺疏，还是群书杂识，都有丰富的校勘成果。另外，清代读书记和提要、目录中也有丰富的校勘资料。由于学派的形成和学派间的争鸣，清代校勘理论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，这些理论成果见于当时学者的各类著作中，有时在他们的往来书信中也有记述，取得了十分广泛的成果。由此不难看出，宋代及宋代以后，资料不仅数量多，而且种类多。所以时下的校勘学专著在谈及校勘史时，一般略宋以前，详宋至清。我们力图使宋以前不至太简略，因为太过简略，不但不足以反映此期学者的成果，而且不足以见出校勘的发展源流。其实就大的校勘方法来说，是很早就已具备了，后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校勘方法的精密化和校勘依据的学术化。所谓校勘方法的精密化，主要是指在校勘所据版本及版本系统的考求上更加详明，在校勘所据异文或其他证据的甄别和运用上更加科学等等；而所谓校勘依据的学术化是指在辨误、证误、证非误的过程中或者运用了精深的文字、音韵、训诂知识和其他专门知识，或者运用了历史考据的成果，甚至其校勘本身就是当作一种史实考据来做的。所以说，方法的后出转精，实际上是与整个涉古学术的进步，特别是传统语言文字学和历史考据学的进步分不开的。基于这一认识，我们在考察隋唐以前的校勘史时，不但摘出当时各位学者著作中的校勘实例，通过实例见其校勘方法，而且，还就这一例列出了后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，以供对比，有把握时，我们对各家是非也加以判断。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。

现在校勘史一般讲得比较简单，大多仅作为校勘学专著中的一章或一节。本书以全书讲校勘史，不但在材料引证方面比较充

分，而且在前人的基础上，有所深入，有所发现。本书有如下特色内容：

一、重视相关学科发展水平对特定时代校勘的影响，如传统小学，特别是文字学、音韵学水平对校勘的影响等。

二、结合古书由抄本到刻本的发展过程，讲清了古人纠正讹字的方法的演变。发现古人纠正讹字实际上包括“是正字体”和“纠正字种间相讹”两项。

“是正字体”是刻石经、确定经典定本中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两汉抄写，多省偏旁字，借音字；魏晋南北朝则喜以他们自认为的古字、奇字改原字体；唐写本中又多俗字；而唐宋及元初校勘，则以正字改俗字、怪字，特别是在儒家经典中是如此。在唐代，学者通过字样学研究，分清一个字的形体的正、俗、通，然后据此确定古籍，特别是经史名著中文字形体，在这方面，并没有强调版本的作用。这与宋以后的校勘是明显不同的。

“字种间相讹”包括形近而讹、音近而讹、因上下文而讹等小类。这属于我们通常说的校勘的内容。

三、重视经史子集四部各自的校勘发展史。毫无疑问，校勘的发展、校勘方法的完备、校勘过程的规范化，都与古人对儒家典籍的重视和整理分不开。但纵观校勘史，经部之外典籍的校勘也在发展之中，并与经部典籍的校勘互相借鉴。

两汉学者有不少人从事子部诸子书的笺注，其中不乏校勘内容，唐代还是有些学者从事这一工作，如尹知章的《管子注》等。不过，诸子典籍得到高水平的校勘是在清代，而清代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，与将经部校勘的经验全面移用到子部典籍有很大关系。另外，对于子部中的医书，也一直有学者在进行校勘整理，唐宋打下了基础，元代还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而宋元明清均有对宗教类典籍的校勘。

史部典籍的校勘是与编史、考史分不开的。两晋南北朝时即已展开，校者或在补订史实中涉及校勘，或者学着儒家经典中的做法，为史部的经典性著作作音义，唐代颜师古《汉书注》也还是这个路数。宋代的考史工作做得较好，到清代，无论考史还是校史，

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。

集部典籍的校勘也是在集部经典的注释著作中首先打开局面的，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成绩还只一般，最可称道的是李善的《文选注》。李善注以注明用典作为重点，在进行这个工作中，弘扬了“他校”和“以典故校”的方法。到宋代，为了满足当时士人学习唐宋名家作品的需要，集部典籍的编纂、整理蔚然成风，上至朝廷，下至学者个人，均有涉足。不但在编纂、笺注中做了校勘的工作，而且在翻刻或编纂后，针对已成之别集和总集展开了专门的校勘。在别集方面，如对韩愈文集的校勘成果十分丰富；在总集方面，对《文苑英华》的校勘成绩很大，影响深远。而对杜甫诗、苏轼诗文的一些校勘问题，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，使人看到了校勘的发展与读者人数的增多、读者水平的提高有着莫大的关系。总之，宋代在集部经典著作的校勘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积累了很好的经验。而清代，集部校勘在典籍的种类上大为扩展，已不限于杜诗、韩集、东坡集等几部经典，而是广泛涉及各朝各代的重要作家，并且常常是结合辑编、笺注等工作一起来做的。

四、注重对校勘流派的归纳。校勘形成流派的前提是校勘的独立。校勘的真正独立到宋代才看得见，而恰恰是在宋代，才看到明显的校勘流派。据我们观察，宋代存在以方崧卿为代表的过信古本的对校派，以朱熹为代表的善于涵泳原文、不迷信古本的理校派，还有以彭叔夏为代表的广引他书、讨论同异的他校派。

当然，校勘之分派，最为明显的是在清代，清代“以不校校之”的一派与以理校取胜、勇改原文的一派甚至展开了很激烈的学术争论。今天我们来看这场争论，仍很难简单地判断出谁是谁非。但两派至少有一个共同点：他们都对历代浅人妄改、因校而误深恶痛绝。

清代学者对因校而误的情况进行了纠正，并由此促进对校勘条件和考校方法的更深认识。

五、校勘与考据的分与合的问题。在明清以前，校勘与考据是交织在一起的，特别是有关人名、年月等错讹考谬，后来随着版本意识的加强，人们才区分作者之误与刻工之误，并进而加强对致误

原因的分析与校改通例的归纳。

六、对校勘学与时代的关系，本书有自己的看法。有些所谓时代风气并不能在校勘中产生直接影响，像魏晋南北朝崇尚玄学清谈，但玄学清谈并不能影响一切学问。校勘是实学，清谈者一般不搞校勘，而搞校勘者一般不清谈，比如杜预信奉的仍是儒家，讲求的是经邦济世之学，故他在校勘上作出了贡献。另外，时代有风气，但并非当时学者都会随风而转，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，我们发现了古籍的校勘整理事业中存在一种强大的家学传统。

本书的撰写，参考了前贤、时贤的研究成果，力图在材料汇聚、甄别、历史发展线索的清理等方面更进一步。

本书分先秦、汉魏南北朝、唐代、宋代、元代、明代、清代七个阶段分章展开校勘史研究。